

五

集

詩

詞

譚人鳳撰

甘肅人民出版社



K257.06/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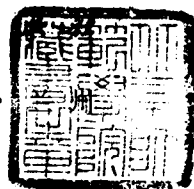
石叟牌詞



谭人凤 撰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



93 770

石 叟 牌 调

谭 人 凤 撰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7 插页2 字数160,000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

书号: 11096·60 定价: 0.75元



譚人鳳遺像



在上海黄公馆的革命同志

第二排右起四人：

谭人凤、陈其美、

孙中山、黄兴。第

一排右起第一人为

宫崎滔天。一九一

二年摄于上海

编辑凡例

一、「石叟牌词」计四十九组，每组由词、图、叙、评四部分组成。为便于阅读和研究工作者使用，故全文照登，不作内容和文字上的改动。

二、资料中有污称我国少数民族的字句，表现了大汉族主义倾向；也有对人民群众怀有偏见或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的地方，因系历史资料，概仍其旧。

三、资料中除个别字体仍需采用繁体字外，其余繁体字、异体字一律改排简体字，并重新标点、加注。

四、资料中除了叙事失实、文中需要疏通之处酌加注释外，其余不详加注释，一般较长的注释均列在正文之外，附于各组之末。

五、资料中残缺之字，以□代之；错字、别字和衍文的校勘以及其他简单注释，均加在正文之内，一律以（）标明；原稿注释在正文之内者概以【】标明，以示区别。

六、纪年原文用阴历者，酌注公历，一律以（）标明。

七、校勘和注释只以校者所知为限，不知者阙如。

目 录

介绍『石叟牌词』	林增平(一)
校点『石叟牌词』的说明	饶怀民(七)
石叟牌词	(一四)
章炳麟序	(一四)
石广权序	(一四)
陈浴新序	(一六)
牌词	(一七)
一	(一七)
二	(二十)
三	(二三)
四	(二六)
五	(二八)

六		(三十)
七		(三二)
八		(三四)
九		(三六)
十		(三九)
十一		(四十)
十二		(四三)
十三		(四六)
十四		(四八)
十五		(五一)
十六		(五四)
十七		(五七)
十八		(六一)
十九		(六三)
二十		(六九)
二十一		(七二)
二十二		(七五)

二十三		(七九)
二十四		(八三)
二十五		(八五)
二十六		(九十)
二十七		(九三)
二十八		(九七)
二十九		(一〇一)
三十		(一〇五)
三十一		(一〇九)
三十二		(一一一)
三十三		(一一五)
三十四		(一二〇)
三十五		(一二三)
三十六		(一二六)
三十七		(一二八)
三十八		(一三四)
三十九		(一三六)

四十.....	(一四〇)
四十一.....	(一四四)
四十二.....	(一四六)
四十三.....	(一四九)
四十四.....	(一五三)
四十五.....	(一五七)
四十六.....	(一六二)
四十七.....	(一六六)
四十八.....	(一六九)
四十九.....	(一七一)

附录:

章炳麟「前长江巡阅使谭君墓志铭」.....	(一七四)
谭沐春「石屏传略」.....	(一七八)
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家谭人凤.....	周秋光(一八一)

介绍『石叟牌词』

「石叟牌词」是谭人凤于二次革命失败后，又一次亡命日本，隐寓福冈县太宰府町菅公庙时所撰（一九一六年返国后可能稍有补辑）。每组有「词」、「图」、「叙」、「评」四部分，纪述自己一段经历，咏怀当时心境和感受，评论涉及的史事和人物。全卷计四十九组，叙事起于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谭开始接触新思潮，慨然兴救国匡时之志，止于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二次革命的失败。

「牌词」系自述经历，可以说是作者的自传。

谭人凤在「牌词」里，以牙牌开合正变的不同形式，谱为词，纪述自己怎样从一个「泥于试帖词章」的乡间塾师，因关怀国事，蒿目时艰，从而走上结纳会党，图谋反清起义的道路。嗣因起义失败，被迫出走，旋即东渡日本，又是怎样由倾慕孙（中山）、黄（兴），向往革命，遂加入同盟会，于是出生入死，为民主革命殚智竭虑的。辛亥革命后，他多方奔走，戮力国事，又是怎样为建成真正的共和国而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读过「牌词」，一个满腔爱国热忱、勇于任事、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家的形象，就会在我们脑际清晰地浮现出来。

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家当中，谭人凤以年事最长、为人鲠直著称。他那爽朗坦率的胸襟，从不阿附权势、随俗浮沉的品德，疾恶如仇、经常面数友朋过失的性格，在「牌词」里也表现出来，给人以深刻印象。比如，他对孙中山是钦敬的，但遇有他觉得不妥当甚至错误的情事，就毫不客气地当面谏争。然而，他也不是逞意气，不识大体。一九〇七年秋，谭对孙中山携款往越南经营两广边境起义事，本有误会，颇生訾议。但当一部分同盟会员按会党开山堂办法，别组共进会谋在长江中游发难时，他即认为这是与同盟会「分道扬镳」，是「反文明而复野蛮，尤力持不可」。因此，谭虽有好骂人的声名，却并不是性情乖张，喜欢使气骂座的一类人，而是当时革命阵营里一位刚正热情的铮铮长者。

在纪述自身经历时，谭人凤不可避免要涉及当时革命运动中的许多重大事变。因此，「牌词」的大部分内容，又可说是关于辛亥革命的一卷信史。

谭是一九〇六年加入同盟会的。从当年十二月萍浏醴起义始，同盟会组织的起义，他曾多次参与，均有纪述；有些事变因亲历其境，记载尤为翔实。武昌起义后，谭往来鄂、湘，在「牌词」里，他对湖南响应起义，焦达峰、陈作新的遭杀害，以及赴鄂参与阳、夏战争，嗣又出任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在武昌筹防等过程，既有记录，且多评论。特别是关于袁世凯凶险狡诈地篡窃革命果实的描绘，是相当深刻的。至于「宋案」和二次革命，更是谭人凤撰写「牌词」时还正为之扼腕愤懑的近事，因而纪述尤为周详。

若干史事，谭人凤因系亲闻目睹，所以知其底蕴，记载似更为可信。如一九〇八年春黄兴由越南

边界发动起义，攻取钦州时，据刘揆一在「黄兴传记」里称：「首先战败清军两营于小峰。不意该两营均属郭人漳部下，公不知为郭军，故有此冲突。未举事前，曾与郭有接济弹药之约，至是郭以公为有意，遂遣全军出与为难。三月初二日，两军剧战于马笃山。……郭军三营全溃。……郭人漳失败后，遂大与党人为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第二九一——二九二页）。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亲往游说郭人漳接济弹药的是谭人凤，他在「牌词」里记载往返交涉情况是这样的：

「……克强此时（按指从镇南关（今友谊关，下同）退出后——引者）之雄心壮志，固犹未已，特以子弹无来源，颇焦灼。适余至，因与郭有旧，遂往求接济焉，时丁未十二月二十五日夜。二十六深夜抵郭行营，谈颇洽。次日相随入城，适省报道街复职，贺者盈门，态度忽变。戊申正月六日，郭率两队赴原防，余相随返防地，隔越之芒街仅一小溪。芒街多同志，且郭随带之队长、排官，均与余在广西有旧，拟就近图之。忽一夜，郭遣人邀余至，则曰革命事败矣，奈何？出省城所发二辰九电报见示。余阅毕，喟然叹曰：「天不佑汉，受此损害，事诚可哀。但所购之械不止此，尚有一、二船，当不至一误再误。其实此事究不知为何人购办也。」郭惊讶久之，问越南现有军费多少，则曰不过数百万。郭闻之心复活，状颇真挚，而余之前念遂息矣。次日遣其侄朴存随赴越。余遇各同志，即介绍此系郭统领侄，则皆会意。故郭侄有所问，辄称道兵如何多，餉如何足。至夜，克强招郭侄小饮，复铺张表示，席间连接四函，两系报告准备攻取龙州各军情，矜以第一、第二军印信，两系法文，由舌人译述，则谓某处某处汇寄款若干万也。郭侄色舞眉飞，

无复疑义。次日邀余送返，一一据禀，且极力怂恿，无俟余饶舌。郭遂允如所请，拨济枪弹，约定地点交过。孰意余返时，克强已入内地，急往报告。有广西陆军学生何克夫等六人同船行，携带军用品，在镇南关发现，均被扣留。郭惧挂误，乃悬赏缉余，并召归委派驻越之学生王德润，杀之以灭迹，事乃又成泡影矣。……」

据此可知，郭人漳之所以遣全军出与为难，并非由于误会，且其大与党人为仇，也不是因为所部军队败溃。真实原因在于，郭本不是革命者或同情革命的人，而是一个首鼠两端，贪利忘义，居心叵测的反动军官。

又如，一九一一年广州三·二九起义的失败，人们都相信，其原因之一，是以头发公司名义经手运送枪弹的陈镜波，乃清方派进来的间谍。黄兴脱险抵港后第一封报告起义经过的「致海外同志书」（「黄兴集」，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版第四〇页）即提到此事。故不久陈由穗到港，党人就推洪承点把陈诱至九龙僻处，用匕首将其刺杀。但谭人凤却认为，这是那个贪生怕死、背信溺职的胡毅生委罪嫁祸所制造的冤案。对此，「牌词」有一段评论：

「……陈镜波知事无可为，不愿附和，尚有理由。姚雨平经手联络军队，不临阵指挥监视，反致倒戈相向，罪诚难辞，然亦尚因枪弹未得，可以藉口。胡毅生既置身事外，所存枪弹，克强向取不与，姚雨平向取不与，试问留之作何用？未发之先，即设计嫁祸于人，谓陈镜波有侦探形迹，既败之后，尚能安住城内，造登假报，表示党人资格，掩护嫌疑。种种诡谲行为，逆迹昭著。……至陈镜波一理发师也，无甚价格，目为侦探，人自易信之。然子弹手枪，皆由其用头发扎包运

入，克强晋省，陈亦知之。使果如胡所云，则枪弹之存于各机关者，当一时破获，何事败五、六日后尚有各处发现之事情？思患必预防，克强当早被逮于张鸣岐，何反临时失措，逾墙而走（按指黄兴率队攻督署时，张鸣岐才仓皇逾墙逃出）？胡匿省不敢返，陈反来港寻克强，非一反比例乎？陈有母寄胡毅生家，脱有亏心，当迎其母返省也，肯随人夜赴僻处就死乎？党人比时不察，杀一无辜，则又不得不因是非之心而动惻隐之心矣！……」

谭所提出的那一系列令人置疑的问题，发人深省，作为否定陈镜波间谍内奸罪行的证据，是可以成立的。可见，研究辛亥革命史，「牌词」实为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谭人凤阅历丰富，为人刚直，宅心公正，因而评论史事，臧否人物，多数颇中肯綮。故「牌词」又可作为清末民初人物评论集看待。

谭对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锷）都很推崇，但对他们的短处和过失，也严肃地给以批评，而且一般没有苛责或偏颇之处。这在「牌词」里是随处可见的。而令人感兴趣的是，谭对某些人的观察，似乎比其他革命党人更为深刻。如对胡汉民，谭竟能早就看出他的心术不正，有所揭露，故对孙中山倚胡为左右手，黄兴视胡氏兄弟为刎颈交，颇感费解。而事实上，一九〇八年河口起义的失败，胡汉民的举措不当是其原因之一；「三·二九」举义之不成，胡毅生不能辞其罪责，胡汉民又竭力回护，足见谭人凤确有知人之明。黎元洪之出任首义后鄂军政府都督，谭也评论道：「黎元洪一无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统率无人，拥为都督，旋而副总统，旋而大总统，居然命世之英。而察其前后事功，汉口由其犹豫而烧，赣、宁由其反对而败，国会由其违法怕死而解散。」故谭

称黎为共和国的「祸水」，二次革命时，「通电全国，谓此獠不除，国无宁宇。」到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风闻蔡锷有举荐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继任大总统之意，谭立即致电蔡锷称：「黎氏者，乘风云以博倖位，而肇祸共和者也。徐氏者，亡国之大夫也。段与冯者，袁氏之爪牙，以宠禄生心者也。麾下荐而重之，撝谦之德，诚足多矣，仆窃为麾下耻之。」「谭人凤为彻底解决国是致蔡锷函」，「革命文献」第四十八期第一八八页）这种评语，比起同时多数原革命党人的见识，显然要高出一筹。至于评论某些事件，谭也不乏卓识说论。如他用赵盾弑灵公的典故比拟焦达峰、陈作新的遭杀害，指出「谭延闿即未与杀焦谋，焦实因谭延闿而死」，就中肯地点出了这次湖南政变的实质和谭延闿应承担的罪责。类似评论在「牌词」中尚多，不一一枚举。

当然，谭人凤也有缺点和错误，这里，只是介绍「牌词」的史料价值，而不是给谭作全面评价，因此，议论他的缺点和错误，就不属本文范围了。

（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牌词」）

林增平 一九八二年五月

于湖南师院中国近代史研究室

校点「石叟牌词」的说明

「石叟牌词」是谭人凤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亡命日本，隐居于福冈县筑紫郡太宰府町营公庙时所作。经「曾伯兴先生董理原稿，情人汇抄，尚未装订，此稿流落书肆中。」嗣由陈浴新先生「以重价购归」，赠予湖南大学图书馆，一九五三年院系调整时，归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珍藏。遗稿传写，讹错极多，先由陈浴新先生粗校，「功仅三分之一」，复请赵曰生先生「续为校正」，仅纠正抄本中少许错字，仍未恢复原稿本来面貌。「牌词」中「叙」的有关部分，曾以「石叟牌词叙录」为题刊于「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三期。惟抄录不甚完整，其中亦有省略，且有少许讹误；余尚有「词」、「图」、「评」三大部分未刊，故世人知有「石叟牌词叙录」而不知有「石叟牌词」全稿者，不知凡几。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手抄孤本「石叟牌词」全稿一直淹留于书海之中。为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湖南师范学院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将整理「石叟牌词」列为一九八二年科研计划，分配我将全稿进行校点、加注，通过将近半年的工作，得以竣事，复经林增平教授校阅。至此，在七十年后的今天，石屏老人的遗世之作，总算全稿公诸于世了！宁非幸事？

以牙牌之开合正变，填词以叙事抒怀，是流行于我国民间的词牌形式之一，为了阅读方便，